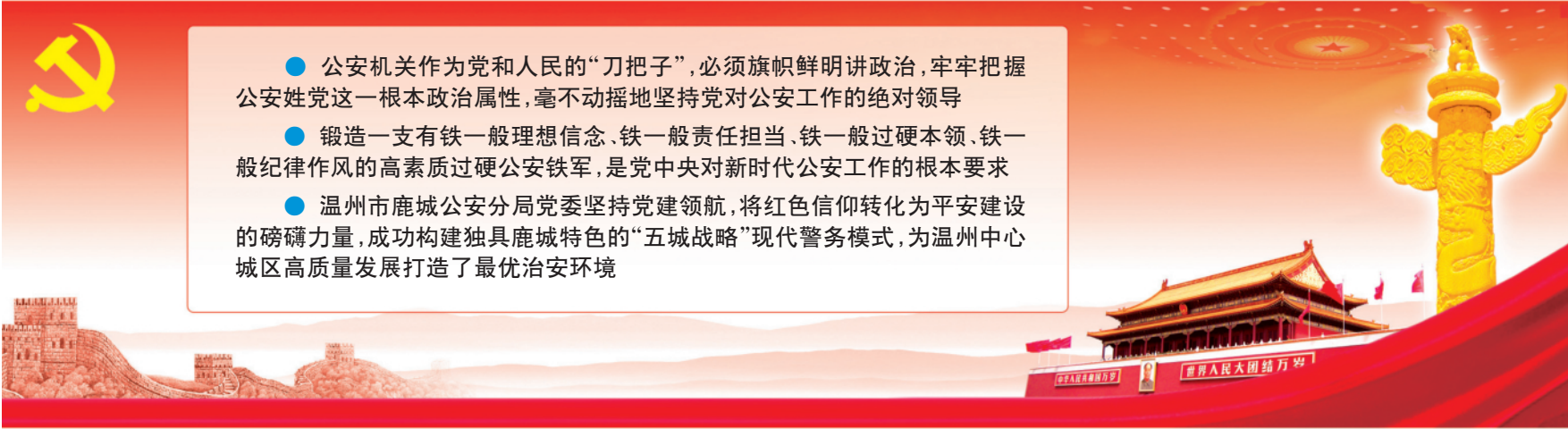


五城战略助力平安夺鼎 31项考评位列温州第一

党建激发鹿城公安核心战斗力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陈道胜

在浙江省建设平安浙江总结表彰大会上,温州市成功捧回“平安银鼎”,作为温州中心城区,鹿城区在去年夺得“平安银鼎”的基础上,再次被授予“平安区”荣誉称号。

军功章里,有着鹿城公安的重要贡献。

2020年,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双喜临门:获评温州市公安机关综合绩效考评第一名,区直机关综合绩效考评第一名,被评为温州市优秀公安局。在市公安局组织的综合绩效考评中,鹿城公安的命案侦破、打击侵犯犯罪、“最多跑一次”改革等31个项目位列温州市第一,占比高达68.9%,综合业绩连续3年领跑全市。

是什么激发鹿城公安爆发出如此强大的核心战斗力?鹿城区委常委、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国林对《法治日报》记者说,分局党委班子从党建中探索到了路径、汲取了力量,找到了答案。

近两年来,鹿城公安分局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将红色信仰转化为平安建设的磅礴力量,成功构建独具鹿城特色的“五城战略”现代警务模式,为温州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打造了最优治安环境。

党建引领数字赋能
打造智慧党建阵地

据徐国林介绍,公安机关作为党和人民的“刀把子”,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牢牢把握公安姓党这一根本政治属性,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鹿城公安分局党委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把高质量党建工作放在公安工作的首位来抓。

2019年7月,新一届党委班子研究决定按照聚焦政治功能、突出公安特色、体现时代特征的要求,立即在分局办公楼建设党史馆。

《法治日报》记者在鹿城公安分局大楼里看到,党史馆约500平方米,分设在大楼的一楼、二楼,由初心篇、使命篇、铁律篇、暖警篇、担当篇及党员活动室6个部分组成,分别设置党史图文展厅、局史馆、多媒体学习室、“智慧互动”党员活动大厅、“人脸识别定位”党费自助交纳平台等功能区。现在,党史馆已成为分局全体党员干部民警温习誓言、学习党史、灵魂洗礼的红色精神港湾。

“我们在党史馆内设置了‘人脸识别定位’党费自助交纳平台,只有在党史馆内才能交纳党费,目的是让每一名党员民警学党史、知党史,每交纳一次党费,就接受一次党的教育。”鹿城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徐知斌说。

党史馆建成以来,先后有5500多人次前来开展活动。

感党恩
跟党走



▲ 近期,新疆森林消防总队投入专项资金研发了防灾减灾移动科普馆,增强科普宣教的趣味性和专业性,图为该总队在商场内举办防灾减灾科普展展。
▲ 4月13日,重庆渝中警方与美国、饿了么等外卖公司举办“警时携手 全民反诈”为主题的反诈骗宣传活动,成立外卖小哥反诈宣传志愿者团队,将警方反诈宣传品送至千家万户。

党务工作千头万绪,传统“刀耕火种”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的新需求。在数字化时代,基层党组织如何创新开展党建工作呢?

鹿城公安自主研发“红色领航”智慧党建系统,开通“责任体系、任务导图、电子台账、智能评价”等九大功能,分局55个党支部(党总支)、1002名在职党员民警、71名入党积极分子100%纳入管理,实现基层党建规范制度的智能化集成应用和精细化模块运作。

系统还开通智能评价功能,通过精准调取后台数据,自动生成忠诚指数、活跃指数、作风指数等信息,直观展示各党支部(党总支)及全体党员现实表现情况,有效解决了基层党建“做什么、怎么做、如何评估”的问题。

思想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理想信念。鹿城公安分局通过全局民警“大讨论”,提炼“正合”核心文化与“守正、出新、首善、敏行”八字局训,使之成为党员民警的思想行动指南与共同价值追求。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全局55个基层党组织提炼党建核心价值文化,设计品牌LOGO、品牌宣言、品牌内涵,推出特色党建工作法,做到“一支部一LOGO,一党员一旗帜”。

分局党委带头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借力智慧平台、智慧手段,在线直播党委书记上党课活动内容,灵活组织开展党建课程“云学习”、红色基地“云参观”等活动,有效克服场地限制,工学矛盾,最大限度确保全局党员接受思想教育,使组织生活更加便捷,有效覆盖面更加广泛。

善于抓住关键少数
锻造过硬公安铁军

锻造一支有铁一般理想信念、铁一般责任担当、铁一般过硬本领、铁一般纪律作风的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是党中央对新时代公安工作的根本要求。鹿城公安分局党委坚持“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夯实党建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民警的先锋模范作用,以红色力量树立标杆引领发展。

根据“第一堡垒”的战略定位,分局党委深入推进班子建设,高质量引领全局发展,严格执行每周学习、集体讨论、民主生活会等系列活动,与上级党委在思想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

徐国林带头践行“一线工作法”,带动党委班子成员每周深入分管联系单位调研指导,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始终与基层“战斗在一起”。分局党委积极创新开门纳谏方式方法,打造“白鹿警坛”在线调研平台,就重大事项向基层组织、党员“深度征询”意见建议。

基层党支部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鹿城公安分局深入开展“最强支部·最强警队”建设,每年评选5个“最铁班子”和8个“最强警队”,激励基层各党支部(党总支)履职尽责、克难攻坚。

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干部是关键少数,也是事业成败的关键。鹿城公安分局党委将提拔任用、立功授奖、评先评优的推荐权充分下放给党支部(党总支),确保基层组织“权责匹配、知行合一”,让德才兼备、赢得大家公认的同志脱颖而出。

他们还创新“党员发展五大指数优选评估体系”,以量化的形式评估选拔发展对象,有力破解入党积极分子体量大、党员发展指标少的难题,极力营造党员发展公平公正的生态环境,调动民警入党积极性。

坚持“有才有有位”的干部选拔用人导向,建立科学规范年轻干部培养制度,选拔115位“正合”核心人才,80位“雏鹰人才”。通过考绩选优,让一大批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业绩突出的民警获得表彰奖励和职务晋升。

近两年来,经基层党支部精心推选,鹿城公安分局党委共提拔中层干部141人,转任重要岗位46人,6人荣立个人二等功,93人荣立三等功、260人获得个人嘉奖,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贯彻落实五城战略
提升源头治理能力

鹿城区是温州中心城区,也是温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面积29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9万,流动人口58万,地域高度开放,要素高度密集,近年来全区年均接警约10万起,治安形势相对复杂。

鹿城公安分局党委深刻认识到,只有系统谋划、科学施策,才能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

经过广泛征询,反复调研,充分论证,鹿城公安分局党委全盘考虑,构建了一套切合鹿城实际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即实施科技围城、百卡护城、万人巡城、快反卫城、靶向治城“五城战略”,全力打造平安高地。

鹿城西部是以城中村和工业厂房聚居区为代表的治安复杂地区,流动人口达33.3万,占全区流动人口一半以上,其中不乏“前科劣迹”和“高危管控”人员。据统计,2019年西部治理区域刑事治安、侵权、入室盗窃、殴打他人、通讯网络诈骗接警数、受理数分别占全区35.2%、36.2%、68.8%、41.1%和26.6%。因此,该区域一直被称为鹿城的“治安洼地”,长期陷入“治了乱”“乱了治”的被动局面。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鹿城公安分局党委将西部靶向治理作为“五城战略”的“试金石”,各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全力推动“五城战略”落地实践:

织密织严公共区域“天眼网”,人脸识别“布控网”,综合采集“感知网”,推进公安“警灯岗亭”、社会联防岗亭升级联动建设,以“警灯岗亭”为中心点位,与周边联防岗亭形成“平安哨卡”战斗集群;自主研发“平安乐巡”App,开放式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巡防;动态化评估所有网格治安复杂指数,针对问题落实整治,做到“打即所发、打发同步”;在鹿城重要部位建设两个特警实战基地、4个特警驻点岗亭,组建近300人的“猎鹰”突击队负责值守,极大缩小作战半径,提升快速反应能力……

去年7月10日15时13分,鹿城公安接嘉兴市公安机关转警,25岁的四川女子胡某买菜时被一名30岁的四川男子余某持刀控制。经查,余某与胡某有感情纠葛,余某将其带上车后,在S26诸水高速上往温州方向行驶。

接报后,鹿城情指联动中心立即启动重大案件处置预案,指令全区各派出所38个在路面上执行巡控任务的“两大一控”巡处单元立即切换设卡模式。当天16时,根据线索发现车辆出现在鞋都辖区,当班指挥长立即将卡点转移至鞋都所辖区各个主要交界路口,将车辆封控在鞋都辖区内,同时指令特警PTU与鞋都所巡处单元在鞋都辖区内开展地毯式搜查追击,同时将最新获取的相关车辆、人员信息通过对讲机向路面警力进行通报,因快速反应、处置得当,仅40多分钟便发现目标车辆并成功拦截。

这起跨市挟持案得以成功处置,得益于“五城战略”联防联控体系的成功运用。

从精准智控的“科技围城”,到精准防控的“百卡护城”,再到精准联动的“万人巡城”和“精准治理的“靶向治城”,以及精准处突的“快反卫城”,“五城战略”警务模式不断提升鹿城公安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与源头治理能力。

2020年,鹿城区刑事治安总警情同比下降16%,命案发案率同比下降37%,盗窃警情同比下降26%,成效明显。

今年以来,鹿城公安分局党委以打赢建党100周年大庆安保硬仗为总目标,秉持自我革新的红色精神,扎实推动“五城战略”精准化、精细化、精密化,着力建成“视频实景融合”指挥平台升级科技围城战略,凸显“平安哨卡”岗亭特色功能升级百卡护城战略,融通基层治理“四个平台”升级万人巡城战略,探索“数字化”治安监测警力调度升级快反卫城战略,推行“瞄靶-打靶-清靶”三步走机制升级靶向治城战略,进一步形成现代化治安治理合力,不断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制图/李晓军



▲ 近日,浙江省舟山市首台24小时“不打烊”临时身份证明自助服务机在朱家尖蜈蚣峙港区亮相。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本报通讯员 邹训永 摄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本报记者 王阳

四月的红安,春雨绵绵。

在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的长胜街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明清风格建筑,当地人称其为“南庙”。2021年3月1日,位于庙里的七里坪革命法庭旧址,被全国普法办命名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此前,七里坪革命法庭先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4月7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七里坪革命法庭旧址,陈列馆的解说员激情讲解:七里坪革命法庭除了作为“中国革命第一法庭”享有3个国字号荣誉外,还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多个“第一”。而第一法庭和第一国家公诉人的设立,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革命第一法庭诞生

红安县位于大别山南麓,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因这里诞生了223位将军,素有“中国第一将军县”盛誉。

从红安县城往北23公里,便到七里坪镇。早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黄麻起义”就是在这里打响了第一枪。之后红四方面军、红二十八军在这里诞生。鄂豫皖苏区的首脑机关在这里决策指挥,七里坪也因此拥有过“列宁市”的美名。

青砖灰瓦,飞檐翘角。七里坪镇长胜街南端,始建于明末的南庙就在这里,现为七里坪革命法庭旧址。《法治日报》记者从正门进入,看到右手边就是当年的审判庭,90多年过去了,里面摆设依旧。

亮光从屋顶上的透明玻璃瓦照射进来,落在了桌角。梨头旗的下方是审判桌,桌后有3把椅子,居中的是审判长座位,两边是陪审员。面向审判桌的右边,也有一张桌子,分别是控诉人、公诉人和书记员座位。而审判桌的正对面,则是一条旧式长凳,离墙上写的是“被告人”。

离开审判庭不远处,有一个10多平方米的小房间,门前挂着“合议庭”牌子,房间里有一个方桌、4条旧式长凳,桌面上还放着一盏老式马灯。

据红安县文物局负责人介绍,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到1927年5月,农协会员达到5.6万余人,黄安县(现红安县)各区都建立了农协。“极端仇视而又害怕工农的土豪劣绅纷纷勾结军阀势力,对农协积极分子和主要成员进行暗杀。”

为惩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召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起草《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暂行条例》,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随之成立。

1927年4月,七里坪地区农民协会按照董必武的指示,成立了以审判土豪劣绅为主要职能的七里坪革命法庭。

陪同采访的红安县检察院工作人员江玉卉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当时七里坪革命法庭管辖范围包括县城以北几个区,抓捕任务由农民协会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完成,革命法庭依照《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公开审判。对于罪大恶极需要处决的土豪劣绅,报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核准后执行。

七里坪革命法庭首任主席张南一,原名张香奎,因常穿着蓝色长衫,以打鼓说书为名宣传革命,而被称为“蓝衣先生”。后来,他以谐音“南一”为名从事革命活动。

张南一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法庭主席审理的第一案,就是判决他的土豪劣绅亲舅舅,给当地反动势力当头一击。

1927年5月13日,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在县城校场岗举行公审大会,公布判处李介仁、阮纯青、李仕显等6名土豪劣绅和土匪地痞死刑后,宣布执行枪决。当年6月底,经过审判惩处了反动派、土豪劣绅、土匪流氓等罪大恶极者40多人。

到了1927年7月15日,形势突变,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七里坪革命法庭也被迫停止活动。

“早期的七里坪革命法庭名义上由国民党党部管理,实际上,法庭人员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他们白天在法庭办公,晚上到各地发动群众起来革命,为即将开展的黄麻起义积蓄力量。”红安县党史办负责人介绍说,虽然七里坪革命法庭的存在是短暂的,从1927年4月至12月,仅9个月,但有力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见证了早期共产党人运用法律手段为贫苦人民伸张正义的决心和勇气。

恢复重建更名为红安县革命法庭

1928年4月,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重返七里坪,开始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

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1930年3月,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在七里坪镇紫云阁家祠堂成立。1931年底,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诞生,黄安战役首战告捷,为了纪念这次伟大胜利,黄安县更名为红安县。随着红安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七里坪革命法庭在原址恢复重建,并更名为红安县革命法庭。法庭内设秘书股、审讯股、登记股等,街上到处设有检举箱,审判的重点是破坏鄂豫皖苏区生产和建设的反革命政治犯和经济犯。

红安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胡卫红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当时重建的七里坪革命法庭不但机构健全、程序规范,而且人员充足、执法有据,除了涉军案件由专门的军事法庭审理外,其他案件均由该革命法庭审理。

在七里坪革命法庭陈列馆展出的珍贵照片中,有一组革命法官烈士的群体照片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张南一、闵丹桂、夏国仪、秦绍勤、戴雪衡等。

1928年3月,张南一因叛徒告密被捕,被捕后,敌人先以重金收买无效,继施酷刑,张南一坚贞不屈,被敌人割掉舌头,推下沙坑活埋。

1930年,为纪念张南一,黄安县苏维埃政府将七里坪小南门命名为“南一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用法官烈士的名字命名的地名。新中国成立后,红安县县委、县政府又将“南一门”所处的街道命名为“南一大道”。

1931年底,闵丹桂被选为红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革命法庭庭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女庭长。

当时,正值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严峻时刻,黄安县第四区一乡六村游击队长吕正勇叛变投敌,向反动民团通报情报,并把苏维埃政府存放的粮食交给民团。闵丹桂接到举报后,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人到民团盘踞的乡村去调查核实,并将叛徒抓捕归案,就地枪决,同时将其罪行印成布告,四处张贴。这一行动沉重打击了破坏革命的不法之徒,激励了广大人民继续革命的热情和决心。

1933年9月,闵丹桂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后被迫认为革命烈士。

“国家公诉第一人”出现在这里

白驹过隙,岁月如梭。

1931年7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规定在革命法庭内设审判委员会、国家公诉员和辩护人。

为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巩固扩大革命成果,鄂豫皖苏区颁布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条例》,在全国各大苏区中率先建立了监察机构,对违反苏维埃法规的,由革命法庭予以审判,初步将反腐倡廉纳入法治化轨道。革命法庭下设有国家公诉处,其工作人员为国家公诉员,规定“国家公诉处要研究(对)破坏苏维埃政权法令之案件提起公诉。当法庭审问被告人的时候,国家公诉员要证明案犯之罪恶。”这是人民检察历史上首次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设置。

29岁的程玉阶任革命根据地国家公诉处第一任处长,后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认定为“国家公诉第一人”。

资料显示,程玉阶担任国家公诉处处长期间,积极运用公诉职能,严厉查处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腐化、放弃职责、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和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出庭支持公诉赤诚显(现商城县)杨山煤矿经理高振武贪污销售款1000元案,经革命法庭审判,高振武被判处死刑。

为了牢记红色历史,传承红色检察基因,红安县检察院党组班子精心谋划,通过寻根溯源,查阅史料和走访当事人,收集和整理了中国检察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部分“红安足迹”,历时两年,建成了面积达400平方米的院史陈列室。

4月7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红安县检察院设在九楼的“院史陈列室”,这里既有辉煌的红色历史,又有鲜活的追梦历程。一件件珍贵的文物、照片和视频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检察人追求真理的坚定信仰。

红安县检察院检察长肖志飞告诉《法治日报》记者,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推进,我国检察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一代又一代红安检察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在追梦路上,不断收获喜悦。先后获得“全国人民满意检察院”“全省人民满意检察院”“全省最佳检察院”“全省政法队伍建设先进单位”和“全省模范公务员集体”等称号,四次蝉联“省级文明单位”,连续多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案管办确定为基层联系点。